

# 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兼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

郑树清

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中谈到要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时指出，正确认识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报告重申了陈云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并指出了我国今后对企业进行四种不同管理方式的设想。这一设想实际上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将建立起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这是对我国三十多年来认识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关系的一个深刻的总结。正确认识这一总结，摆正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这一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就取得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客观经济条件。从1953年开始我们便进入了宏伟的有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建设时期。三十二年来，我们在计划经济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我们的计划经济也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从1958年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又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本来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迅速走上按比例发展的正确轨道，可是两年的“洋跃进”，使原来已经失调的比例关系更加严重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历了如此的曲折不能不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国民经济总是出现比例失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究竟还灵不灵？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有的同志提出，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弊病引起的，在我国缺乏一种对比例关系自动予以平衡的经常性的力量。因此，如果建立了以全面市场调节为机制的经济管理体制，就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我们计划体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病。长期以来，我们在计划管理中只强调单一的计划调节，忽视市场调节，甚至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只有计划调节才是社会主义，市场调节就是资本主义。这种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不是马克思设想的没有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而是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的计划经济。这样，就使我们许多企业的生产脱离市场，为生产而生产，使许多国家计划不到而社会又急需的商品也得不到生产。结果，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浪费和混乱。因此，否定市场调节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是，

能不能说，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就是由于缺乏市场调节而引起的呢？建立了以全面的市场调节为机制的经济体制就可以防止比例失调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地下结论，而必须用我国经济建设本身的历史事实来回答。

我国国民经济发生比例失调的情况并不是1958年才发生的。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就发生过二次比例失调。一次是1953年。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52年底，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财政收入在帐面上出现了三十多亿的结余。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不知道当年的财政结余已经由银行贷出去搞基本建设了，因此，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又把它当作基本建设投资来使用。结果闹了一个“一女二嫁”的笑话，立即引起了全国物资供应的紧张和物价的不稳，使当时的计划价格上涨了5.7%，集市贸易价格上涨了好几倍。另一次比例失调发生在1956年。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在望。再加上公私合营，资本家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有些同志头脑开始发热，在安排基本建设时比1957年多增加了59%，结果市场又马上紧张起来，直到第二年把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形势才开始好转。这两次比例失调，只是由于发现及时，纠正也快，才没有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应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多种经济成份还并存，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发挥得较好，为什么那时也会发生比例失调呢？可见，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生比例失调与市场调节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那么，我国国民经济的几次比例失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1925年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种较为重大的错误，任何一次较为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与需求总量之间严重脱节现象，都不可避免地要由某种危机来纠正……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8页）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发展。马克思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不可能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列宁逝世过早，也没有来得及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而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在这里所说的经济危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比例失调。斯大林深刻指出了产生这种比例失调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计划工作中的“严重失算”。这样，斯大林不仅为我们找到了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而且指出了搞好计划工作的重要性。我国三十二年的实践证明斯大林的这段话是正确的。我国的几次比例失调，不是经济体制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计划工作的失误造成的。如果我们在1958年不提出钢铁要翻一番，粮食要翻一番，把积累率一下子提高到40%以上，那么就不会造成三年大跃进那种严重的损失。如果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不提要建立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不引进二十二个大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日子也会好过得多。因此，在经济体制与计划工作的关系上，计划工作本身是第一位的，经济体制是第二位的，经济体制归根结底是为计划工作服务的。我们的经济体制，包括计划体制中的严重弊病固然会加深我们计划工作失误造成的危害，但造成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显然不在于缺乏市场调节本身。

计划工作的失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但并不是说计划经济本身没有优越性。

斯大林曾经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根据有计划发展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它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只是为我们有可能正确地去计划社会生产创造条件，而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经济规律。如果我们在计划工作中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得不到发挥。三十二年，我们经济建设大起大落并不是计划经济制度不好，而恰恰是我们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得不到发挥的结果。有些同志看到我们计划工作发生了多次严重失误，就怀疑计划经济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因而主张建立全面的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全面的市场调节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陷入象资本主义那样的无政府状态，这会给我们的生产力带来更大的破坏。那么，通过市场调节来纠正计划工作的失误，这是不是也有可能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计划价格占着主导地位，价值规律要发挥作用，多少要受到计划价格的制约。因此，靠价值规律来纠正比例失调，这在我国的经济条件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国三十二年来的实践证明，全局性的计划工作的失误只能靠正确的计划本身来加以纠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两次比例失调是靠中央正确的计划本身来加以纠正的，1953年三年大跃进也是靠中央提出“调整、整顿、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正确安排和制定了新的计划才加以纠正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比例失调能够而且必须靠中央正确的计划本身来加以纠正，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我们今天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必须坚持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含义。市场调节是价值规律的调节，但是价值规律的调节并不等于都是市场调节。价值规律的调节有二种形式：一种是自发的调节，一种是自觉的调节。我们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的各种范畴、价格、成本、利润、利息等去调节生产和流通，这本身应当是计划调节。因为在这里价值规律表现出来的作用只是实现计划的工具和手段。因此，严格说只有自发的价值规律调节才是市场调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不是市场调节，而属于计划调节的内容。认识这一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能使我们注意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不同点，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必须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为条件。同时，也能使人们注意到由于市场调节是自发的价值规律调节，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中谈到我国体制改革后对企业实行四种不同管理方式的设想。第一种是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第二种是按照市场变化需要进行生产；第三种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自由生产；第四种是大部分按市场变化生产，小部分按计划生产。赵紫阳同志还指出，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运用价值规律。这就告诉我们，这四种不同的管理方式，实际上都有一个价值规律在发生作用的问题，所不同的是，第一种方式是国家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第二种是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生产；第三种是自觉为主自发为辅；第四种是自发为主，自觉为辅。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和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情况也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计划价格占着主导地位，自发地调节，多多少少受到计划价格的影响。因此，这种自发调节也就决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漫无边际的调节，而是在计划指导和影响下的调节。

但是，由于市场调节仍然是自发的价值规律调节，因此，如果对市场调节不加引导和限制，它就会冲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一定的破坏。前一时期，为什么我们许多农产品的收购任务派不下去，产品收不上来？为什么有些地方和企业仍然不顾国家的需要继续生产那些价高利大而国家不急需的产品，而一些价低利小的国家急需的产品仍然得不到生产？为什么基本建设的规模控制不住，盲目生产，重复建设的现象会有增无减？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市场调节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我们只看到它积极的一面，看不到它消极的一面，那就会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新的破坏。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农业生产也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有些同志以为，农业生产绝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可以不要计划为主，自己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有些地方不顾国家计划安排，任意把粮食耕地改种经济作物，还美其名曰“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因为经济作物价格高，收入多。这种不顾国家计划，片面理解发挥优势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粮食生产始终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我国是一个有将近十亿人口的大国。十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大局出发，什么价格高就种什么，任意把粮食耕地改为种经济作物，那我们十亿人口吃什么？有的同志说，我们可以拿经济作物到国际市场上去换粮食。这些同志殊不知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解决的。如果我们把种粮食的土地统统去种经济作物，不仅国际市场上不会有那么多粮食与你交换，而且购买粮食一多，粮食价格也会马上上涨。这样，我们的经济作物在国际市场上仅有的一点优势也会丧失殆尽。因此，不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点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搞好计划经济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由于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还不是马克思设想的没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我们还不能够象管理一座大工厂一样来管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流通；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还不长，我们计划经济的各项制度，包括计划体制本身也还很不完善；由于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甚至还缺乏象电子计算机这一类进行现代化计划管理的手段，等等。所有这一切，确实给我们的计划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削弱甚至取消计划经济的理由，因为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的计划经济制度，只要我们真正把计划经济搞好了，使我们的国民经济真正走上了计划经济的轨道，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一定会出现“新的振兴时期”。

· 书 讯 ·

## 孙逊著《红楼梦脂评初探》出版

我院教师孙逊的新著《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见于《红楼梦》早期抄本上的脂砚斋等人的批语，是最早评论这部不朽巨著的珍贵资料。系统地探讨脂评，对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孙逊的这本著作就是他在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该书分“引言”“脂本、脂评和评者概述”“脂评价值浅探”“脂评糟粕批判”“脂评历史地位试论”等五个部分，这本25万字的专著通过对脂评的整理和分析，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它的思想、艺术和资料价值，同时，对它所表现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形式主义艺术观作了适当批判。作者目光犀利，立论有据，推理严密，颇见学术功力。

(茅)